

# 孙逸仙近代思想 与郑观应、容闳、严复、胡适之比较

(美) 吴相湘

孙逸仙是20世纪初叶人杰中,最早为世人知晓,且至今仍受人崇敬的唯一人物。其讲述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有汉文及地方方言的各种文字版本将近800余种,日文、韩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泰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印度文、捷克文、波兰文等20余种各国语文译本。1994年即孙逸仙创立“兴中会”一百周年纪念,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出版韦裘莉女士、马若孟、格林教授三人编译的《救中国的良药:孙逸仙著作选编》(Prescriptions for Saving CHINA by Jolie Wei, Ramon H. Myers and Donaod G. Gillin),指称这是孙逸仙著作选译为英文刊行之首次(《三民主义》及《国际开发中国实业计划》两书早已有英译本)主编人且尊称孙逸仙是“近代中国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A)同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并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发行一册由卫藤沈吉与史扶邻两教授编著的《中国的国民革命》(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Edited by Eto Shinkichi and Hazold Z. Schifsrin)也尊称孙逸仙为“国父”(Father of Nation)而在这以前,美国加州大学张绪心教授(U.C. Fresno, Ca)跑遍中外29所大图书馆收集有关孙逸仙著作版本编辑成《中山先生共和革命资料研究集成》(Bibliography of Sun yat-Sen in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1885-1925), Compiled and Edited by Sidney, H. Chang and Leonard H. D. Gordon, 1991)初版早已售完,现正改编,增加1989年以后新出版的资料,预订一九九七年内在美国出版。①

不仅如此,孙逸仙倡导的“耕者有其田”、“都市全面平均地权”等原则,在中国台湾省实施的成绩,固早已受世人注意。即神州大陆近15年来改革开放,欧美日本东南亚诸国资本与人才先后涌往投资设厂或与中国合资经营。70年前,孙逸仙倡议“国际投资开发中国实业计划”终告实现。中国本身建设铁道、公路、海港、飞机场以及轻重工业,由于时代进步科技发展迅速,孙逸仙之《实业计划》中所规划的若干项目,也显现出一些成绩,且过之无不及。

孙逸仙一生60年,矢志振兴中华,促进中国近代化。经过十次起义失败,两次濒临生命危险,终于震醒国魂,建立民国。这完全是他正视现实,随时接受挑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辛亥革命成功,自海外荣归故国时,他已环游世界六次半,时间空间的变化与进步,耳闻目见,经验的积累,是其所有重要主义、计划、大纲所以形成的基础。②

比较20世纪初世界人杰,如美国威尔逊总统、俄国列宁、土耳其凯末尔、印度甘地等言行,今不仅多已被世人所遗忘,甚至还有被其国人否定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就中国本身说来,孙逸仙的前辈或同辈中志士仁人有关救中国兴中国的言行,也没有一人具有相提并论的经历与知识。其受世人崇敬绝非偶然。西哲所谓经验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力量,及中国古谚“取精用闳”、“融会贯通”由此又得验证。

## (一)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中国满清朝野对自强图存

之道开始有各种不同认识,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对欧洲政制开始有初步体认。现代中外学人于此已多专门论述。本文只就与孙逸仙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位人士的论述作一简要说明,以为孙逸仙自称是“先知先觉”作一证明。

郑观应(1842—1922)是汇集曾国藩以下“商战”观念,且以实际行动进行若干新式工矿商业的一人,加以他先后刊行《易言》《盛世危言》,发表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见解——他曾游历海外,通英文,与洋人也多交往会谈,故其言论也多取资洋人见解。而其年辈早于孙逸仙,是名副其实的乡前辈。孙逸仙与郑观应在澳门曾有四、五年的晤聚,郑对孙的思想有相当的启示与影响。这可于1894年孙逸仙上李鸿章书内容,以及郑致函介谒李鸿章幕府证之。<sup>③</sup>

但郑观应陷于当时政治漩涡,不若孙逸仙之壮怀激烈,且久居岭南香港,一旦北上京津,目睹耳闻,殊多怪诞;加以时值中国甲午战争初起,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竟在黄海诸战失利;究其原因则政治腐败,贪赃枉法恶习普遍,且影响及于新兴海军中。因此,孙逸仙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因而南下至夏威夷檀香山约集华侨同志,创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企望联合中外华人,以申民志而扶国宗。<sup>④</sup>

从此,孙逸仙与郑观应就道不同而不相与谋了。

郑观应主张君主立宪,实行君民共主的上下两院的制度。是取法于英国。就近一百年世界历史来看,自夸不列颠国旗永远面对太阳,早已日趋衰弱,甚至在找寻太阳。这都是老大保守,缺乏日新又新的革新进取精神所致。

而美利坚合众国自建立新邦,独立、创新、进取风气与日俱进,且吸纳各国各族之精英,发展科学技术,即宪法也随时代演进而有修正案,以适应新情势。其第16任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所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信条,更是历久弥新。

中国对日抗战时(1931—1945),美国发行纪念邮票首日封上录孙逸仙与林肯肖像<sup>⑤</sup>。在中国地图上录“民族、民权、民生”及“民有、民治、民享”(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英文。可以说是与孙逸仙1894年创立“兴中会”宗旨遥相呼应。只可惜孙逸仙“取法呼上”,迄今仍没有达到目标,则因全国人口众多,一般教育水平过低,甚至今日还有一亿二千余万文盲。

孙逸仙所谓“不能不稍易以强迫”,就其医学专业言,即一般口服或针注射药剂,不能发生疗效,只得应用大手术,如孕妇将临盆时“难产”或“胎死腹中”,即只有用剖腹手术,以保全母体,亦即民族国家的命脉。今日医学发达,割除乳癌、脑瘤、胃癌甚至换心脏已平常事,而后生命仍得保全。

孙逸仙于兴中会后,即进行计划在广州武装起义,即一般所谓“革命”。而中国古代早有“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于人”铭言。英语世界对Revolution涵义有10项之多。《牛津英语字典:——历史原则新英语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Principles)于Revolution即如此,开宗明义第一义即“天体的动作:太阳系行星为‘日球’、星本身自转,或围绕地球的周转”。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于1514年开始怀疑被人类已经接受1400年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在他逝世前完成6卷有关太阳系转动的有系统的解释的结论摘要。若干年后,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证明哥白尼理论的正确。20世纪这一学说盛行于世。可以说:“革命”一词,不论中英文义大体相同。其只有第七义是“武力推翻当时政府”。孙逸仙于此一再说“革命”与“革新”“维新”是同一涵义。其自述所谓“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就是显示其用心良苦:企盼在一地发动武装起义,以震醒人心,而

不是推动一全国性大规模行动，这对已经贫穷艰苦的中国人民等于是火上加油

## (二)

1854年夏，容闳（1828—1912）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如其《自传》所言：“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余始”。而当其在美国修业期间，中国的腐败情形，时时使他感伤，责任心使命感也油然而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使遂予求学之志，则当旦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

容闳对祖国未受教育之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迫，竟毫无感觉：不知其为痛苦与压迫的麻木莫可奈何的处境最为关切。其自传有云：“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即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就是其后16年中国政府首次公费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计划的最早渊源。<sup>⑥</sup>

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孙逸仙尚未出生。中国首批公派留学学生放洋西行时，孙逸仙还是6岁儿童。而“天演宗哲学家”严复（1854—1921）出生于容闳留学之年。由于容闳建议曾国藩请准满清朝廷公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已具先例。1873年秋，清廷又准按例派遣福建马尾学堂优良毕业生赴欧洲深造。严复即其中一人。嗣因日本构衅台湾番社，严复奉命随扬武兵轮东行拒敌，至1877年4月，严复等一行始乘轮赴英国。<sup>⑦</sup>

容闳自传以为：曾国藩采纳其建议，请准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实以播布种子于世，中国教育前途，实以永远蒙其嘉惠<sup>⑧</sup>。以近120余年史实验证完全正确。且因此而有严复回中国复之致力译述欧洲政治经济思想名著，大有裨益于中国当时志士仁人呼吸新思想，对中国新教育制度的推进也大有助力。

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经曾国藩采纳得以实行，比较其受曾国藩命赴欧美采购机器，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与影响更巨大且深远。

1866年12月，曾国藩奉命回任两江总督。莅任前特往上海参观容闳3年前曾派前往欧美购置新式机器已在江南制造局安装并开始运转，容闳一一说明其运用方法及效用，曾国藩非常欣喜。容闳乘机请于制造局附近设立兵工学校，招收本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之理论与实际。旋蒙曾国藩批准付诸实行。是其怀抱教育计划小试其锋。1870年春，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调北上处理一切。丁日昌与容闳随行同往协助办理善后。事毕，曾国藩领衔与丁日昌等合奏清廷，请将容闳建议派遣青年留学美国计划核准实行。容闳素愿乃得实现，其内心喜悦正如《自传》所言：“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其事，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容闳建议终告实现，时势变化是一重要因素。林则徐于广东面对英国以鸦片输入换取中国白银且毒害华人身心，毅然采取禁烟措施，实在是非常正确的。只以当时满清朝廷君主专制力尚未衰微，竟然革除林则徐职务且遣戍新疆。林则徐知晓英国船坚炮利乃不敢明白奏闻，只得于私人函件中一抒忧怀，且与魏源同床夜话中，透露师夷长技以制夷<sup>⑨</sup>。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满清统治者狼狈出亡，城下之盟，虚骄气焰稍敛。而曾国藩、左宗棠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而募湘勇以与假耶稣基督名号而帝皇自居的洪秀全太平天国作战。屡败屡战，终获胜利。满清朝廷因得维持不坠，长江一带总督巡按势力从此大张。曾国藩功高震主，不免忧谗畏谤，时时警惕，然而地方势力伸张，女主（慈禧）主政，幼帝在位之满清朝廷惟有步历史上“内轻外重”的后尘<sup>⑩</sup>。何况，容闳此一派遣青年留学计划，又是当时朝野“师夷长技以制夷”论调中必行步骤，水到渠成，并非偶然。中经波折，大部分留美学生被召回。在美国耶鲁大学工程学系毕业之詹天佑（1861—1919）主持建筑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开通居庸关等隧道，于五年内完成全线通车，

打破外国人讥议“中国人绝无此能力”之妄言<sup>①</sup>。足见中国人智慧与坚毅的素质，一旦接受新教育获得新知识新技术，必能迎头赶上。

由容闳建议而派遣留美学生四次名单观之，詹天佑以外，如梁敦彦、唐国安、蔡廷干、梁诚、刘玉麟、唐绍仪等学成回国后，在中央政府工作或出使美英均有成绩，其余大多在外交界或工商界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化都有相当贡献。而容闳从弟容耀垣（字星桥）曾参加孙逸仙创立的“兴中会”工作，后又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对国民革命颇有微劳<sup>②</sup>。

中国青年留学美国风气开通以后，相继出国留学男女年有增加，大多怀抱改造中国旧教育为国为民服务的雄心壮志，终有成就者大有人在。如《成志会五十年史略》记载1907年以来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情况，可见一斑<sup>③</sup>。

容闳与郑观应曾有函札往返<sup>④</sup>，但他对于乡后生孙逸仙却迟至1900年仲夏才偶于黄海同舟共济时偶然相遇。在这以前，1900年3月容闳在香港与谢纘泰、杨衢云开始密商合作，容闳还对孙逸仙不甚重视，他对谢纘泰说：“我还没有见过孙逸仙医生。他有多大年纪？我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sup>⑤</sup>。言外之意对孙逸仙1895年广州起义不成一事极不以为然。这可能是容闳与孙逸仙年龄差距大两人经历完全不同。容闳自美学成回国，历经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等大事，自身多次经历不同职业工作，至1872年，才初步实现公费派遣青年赴美计划，又时遭同僚嫉忌。中日第一次战争即甲午之战时的建议也没有被当政者采纳。而义和团运动召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40年间，中国两次被迫为城下之盟，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容闳亲身经历这一切，心中悲愤，又苦无良策而年岁日长，老成持重，对于还不到中年的孙逸仙即知即行，敢作敢为，自不免有“太轻率”之感。然而黄海同舟共济却一见如故，则两人志向相同。

1898年，康有为等推动的“戊戌变政”，不幸在俄国暗中支持顽固守旧人士而演变为“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英国、日本官方保证下得安全逃亡<sup>⑥</sup>，这对于容闳原冀“体制内革新”是一极大打击。加以满清竟奢望藉符咒大刀而不惜与世界各国宣战，更增加容闳决心。1900年3月，容闳在上海积极与维新分子唐才常及严复等筹组自立国会及自立军。1901年春，容闳曾至台湾游历。满清闽浙总督旋有公文到台北请日本驻台湾总督将容闳拘捕转送中国。容闳闻讯坦然表示请便宜处置：“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后容闳离台北赴香港有无“国”可归之苦：中国既欲得而置之死地，美国公民权自1898年即不被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半年后，容闳不顾一切仍前往美国。

1903年冬，美国纽约华人教堂牧师许芹（huie Kin，广东台山人，1854—1934）在旧金山与孙逸仙认识，对孙的志向极表同情，且欢迎孙到纽约时即寄居其教堂内，且不顾当地华人中保皇党人的反对而仍维持孙的起居与活动——许芹与容闳早已熟识，今又有孙逸仙在美。容闳与李荷玛及另一美国人布斯（Charles B. Boothe）等协力在美国积极训练“维新军”，康有为、梁启超先后访美均与容闳晤谈。1908年12月4日，容闳写信李荷玛促即采取武装起义行动，如能取得一省，即任命为总督。旋又将中国各秘密会社名单，包括革命党孙逸仙等抄送李荷玛，并建议邀请各会社领袖来美共商组织临时政府内阁及顾问委员会。

1909年1月，容闳对康有为已表示不满，写信及与美国友人面谈均谓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信赖之维新人物”。主要是对康将华侨捐款作为私用。这是容闳痛心中国贪污腐败，生平自矢廉洁保全名誉，自然对康有为假公济私行为大表不满。而肯定孙逸仙是一很重实际的人，为广东之干城，如加以援助，中国维新计划当可实现<sup>⑦</sup>。

早在1905年8月，孙逸仙在日本东京联合留学生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后，即继续加紧在滇桂边省武装起义行动。1909年12月22日，孙逸仙应容闳邀请自新加坡到达纽约会谈与美国人合作的“红龙计划”，容闳且连续写信李荷玛及布斯支持孙逸仙立场，

并强调请速速筹款，以便孙的计划付诸实行。虽然，“红龙计划”没有成功，容闳尽力促使美国人认识孙逸仙的言行，影响甚大。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之初，容闳原已应孙逸仙的邀请，准备返回祖国，不幸，终以年老多病未能启行而逝世<sup>19</sup>。

容闳是中国留美学生之父，其在教育上成就及其介绍西洋科学的方法与程序贡献于中国重大。近120余年史实已有明证。1954年6月13日，耶鲁大学与中国耶鲁学会（Yale in China，曾在湖南长沙创立雅礼学校及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将西洋新医学传播于中国）举行庆祝容闳毕业百年纪念，以显示其不朽之功<sup>19</sup>。

容闳将西洋新式教育传播中国，对中国近代化大有贡献，这是百年树人大计。而古老中国具有二千余年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的传统，根深柢固，如果不应用强迫方法，彻底破坏，少量新药剂的注入，发生效力究竟缓慢且有限。孙逸仙自始即采取武装起义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国，十次失败，终告成功。容闳于此也转向与孙逸仙协同合作，证明孙逸仙的认识是正确的。然而，中国地域广大，东西南北各地风俗习惯甚多差距，文盲众多，耕地不足，种种问题，仍待时间及国人共同努力解决。而容闳与孙逸仙的言行则历久弥新，仍为国人继续奋斗前进的目标。

许芹对容闳注意于工程与机械的发明及其理想，他更预知飞机的可能性与效用。曾说：“许！将你所有的金钱投资与飞机吧”<sup>20</sup>。当1903年法国第一次试验飞机时，容闳赶往参观<sup>21</sup>。这对于孙逸仙具有影响力。

1910年，李荷玛撰写《飞机在战争：军事上迷思的若干观察》（The Aeroplane in War Some Observation on A Military Delusion）刊载于同年8月出版的Harper's Weekly。孙逸仙时在槟榔屿得阅后即于是年10月6日，写函李荷玛表示意见，指出飞机和飞船等还能作独特的摄影，有助于指挥官准确判断敌情。且以1905年日俄战争辽阳及沈阳战役为例证<sup>22</sup>。由此可见：孙逸仙对国际时事之周密注意研讨，决心迎头赶上。1911年，同盟会会员按孙逸仙指示到美国波士顿参观美国第一次飞行比赛后，更进一步认定中国革命军必须掌握飞机才有打败满清军队的希望。因即设立公司，向华侨招股10万美元，购置飞机，聘请美国技师培养革命空军人材。孙逸仙且手书“航空救国”四字，努力倡导。中国对日抗战时，空军健儿是发挥保卫祖国领空力量，其中甚多旅美华侨子弟。渊源于此时<sup>23</sup>。

总之，容闳与孙逸仙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上，努力“迎头赶上”学习西方新科技以及政制等方面，可说是殊途同归。而容闳、许芹、孙逸仙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尤其孙逸仙在1896年伦敦蒙难九死一生时，幸得使馆管家妇贺维（Mrs. Howe）因为基督教徒而说服男仆将孙求救信函送去终于获释。从此更坚定效法耶稣基督克己牺牲以救人救世的决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如林觉民致其妻诀别书也表示这种愿牺牲自我以保全大我国家的崇高博爱精神至为明显。

### (三)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志士仁人悲愤之余，努力于自强图存，孙逸仙即于檀香山联合华侨组织兴中会，留学英国归来的严复（1854-1921）亦于天津《直报》撰刊论文多篇警醒国人。如其《论世变之亟》，开宗明义即指陈“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名，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知西方真相，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又撰《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介绍达尔文之《物种探源》及斯宾塞尔之《群学》两名著强调“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以废八股为急务，甚至宣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旋于

1896年译述英人赫胥黎之《演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 by Thomans H. Huxley)用“天演论”作书名<sup>24</sup>

严复之首先译刊是书,可说是其深切的危机意识与当时中国时代处境的特殊需要。因严复忧心忡忡是人种的淘汰: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淹,新种迭盛。而中国当时传统士大夫“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因而在严复在《天演论》里藉《按语》将达尔文和斯宾塞尔的演说勾画要旨。即将演化论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作一扼要介绍。

赫胥黎是书提出对付这种灭亡危机的应变的方法,即以伦理控制的方法,充分发挥每个人克己的意志力,将一切“智”“德”“力”以及一切合群的力量,集中起来去抵抗天然的公例,以建立一个道德崇高的社会,寻求人生最高的幸福。

这一构想很适合中国传统“人定胜天”的信仰和论调,也衔接当时中国读书人的危机意识和应变的期待。

英国科学家兼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 Russell 1872-1970)认为达尔文的《演化论》对西方文化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思想,因而发扬;其天然淘汰适者生存论调也间接促成了合群的观念,由个人集结成社会国家,以求生存。这又是国家权利至上民族主义两观念的加强,而演化观念,更鼓励了改革运动<sup>25</sup>

严复倡导普及教育,学习西洋更极力主张必须直接阅读英文书刊,不能自日本译刊的西洋著作以转贩知识。1900年以后,严复口讲手写大都有关教育问题,如《西学通门径 功用语》《论中国教化之退》《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与管学大臣论版权书》《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实业教育》《论小学教科书极宜审定》等。且在译刊《计学》《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诸书之外,又为《英文汉话》详说英文文法,以便学习英语。其用心在促使有志人士能掘井溯源认识了解西学,不为皮毛浅见所误。

严复自称“天演宗哲学家”,且镌刻印章。此与孙逸仙《自传》有言:“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不约而同。1905年,严复因公重游英伦。孙逸仙特往访谈。严复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能逐渐更新<sup>26</sup>。孙逸仙则以为如此,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我是实行家。双方意见尚多差距。其实孙逸仙早认识“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兴中会宗旨既明显,不稍以强迫手段推翻满清统治,中国衰弱是难以根治的。而其后手订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政纲有普及教育一项,以及《遗嘱》殷殷以“唤起民众”为念。可见其与严复见解只是实行步骤先后不同而已。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教育宗旨,注重“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学制取法于西洋。学校科目也多采用西方原书或译文。在人口众多,内乱外患不停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但教育目标可以说已经初步达到。而时代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何迎头赶上,以及消除文盲普及教育,仍是任重道远。

严复译刊《群己权界论》,于自由真义发挥详明。极以滥用个人自由,不尊重他人甚至以侵犯他人自由为念。孙逸仙对“自由”涵义,解说更详明,特别注意提倡民族与国家的自由,而不提倡个人的自由。是因为当时中国所缺欠的是前者,而“个人自由”则“放荡不羁”“一盘散沙”正是国人自嘲或是外人讥讽的。但孙逸仙主张人民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免四权。中国国民党政纲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孙逸仙强调:民主国家国民享有的自由,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而是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与违犯法律为限的自由。可说孙比较严复于“自由”解说更详明。

严复与孙逸仙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最初的认识不同:严复曾严厉责备其第四子。其致友人书更以为“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它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世,则可决

也”<sup>27</sup>。孙逸仙与其同志主持的《建设》杂志则对“五四”加以称许为“新文化运动”，以为是学生的自觉、民众的运动、社会的制裁。两人于此认识完全不同，是经验有异所致。<sup>28</sup>

但其后各地学生时常罢课发生学潮。孙逸仙于此曾大加指责学生的滥用自由。民权主义第二讲有言：“中国新学生讲自由，把什么界线都打破了”。“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工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sup>29</sup>

这不仅与严复的见解不约而同，即与胡适（1891—1962）、蒋梦麟（1886—1964）遥相呼应。蒋、胡于“五四”以后指出：二十年来中国环境变化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这是“五四”以后的我们要讲新学术去救国，这个新学术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因此全国青年学生唯有自德、智、体、群、美五育锻炼，才能创新学术，才是新文化运动<sup>30</sup>。“五四”健将傅斯年（1896—1950）更以为孙逸仙先生创办《建设》杂志，是提倡“中国近代化”。

“五四”前夕，胡适正在上海迎接应邀东来讲学之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教授（John Dewey）。5月12日，胡适、蒋梦麟陪同杜威往赴孙逸仙宴会长谈。时《孙文学说》已完稿将刊行。孙以杜威首创“从做去学习”（learn by doing），而《孙文学说》是重知的哲学，同时也是主行动的哲学；因为重知，所以“知难”；因为主行动，所以讲行动。它与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不同，因王阳明不知分工合作的道理，故“终身由之而不知者众也”。故与杜威教授详谈，企盼他人之石可以攻错<sup>31</sup>。事实上，胡适于《孙文学说》中有关文字与语言例证有所评论。孙逸仙表示接受可加修正，并促胡适编辑国语文法，以完成文学革命之大业。其后胡适果如命编成《国语方法概论》。而胡适既撰文介绍《孙文学说》之重要性，更强调孙逸仙是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孙逸仙认为中国人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严复以愚、贫、弱为中国大患，尤以治疗“愚”为急切，今后中国教育不是尽去传统之旧以谋西洋之新，而是统新旧而视其融合贯通，会合中外而计其全<sup>32</sup>。胡适也认定中国真正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恶魔”，惟有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的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而早在“五四”以前，胡适即认定救国根本大计唯有兴教育，开地藏，革新内政；故终身致力于教育（对日抗战时被征召为驻美国大使时除外），与蒋梦麟等协力在北京大学推动“中国文运再生与新生”（The Chinese Renaissance）既努力西洋新学，也积极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学。此与严复以及孙逸仙先生主张“迎头赶上”西方，同时发扬传统文化道德，遥相呼应，且较实际。<sup>33</sup>

蒋梦麟曾自言：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有时游移于两者之间。如今世局变化万千，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则“中国需要认识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以增加彼此认识，更是中国近代化的必需条件。而正在进行的教育及建设工作，更应继续加紧努力，以企21世纪能达到孙逸仙百年前提示的“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 注释：

① 此据有关书籍内容。张绪心教授1996年8月20日来信。

② 拙撰《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出版。

③ 孙逸仙上李鸿章书中有三项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言论大致相同。唯“不知之人多、能行之人少”是孙创见，也是其后《孙文学说》主要论点。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时曾收录影印。郝延平著《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本，中文译本是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刊，《郑观应传》：夏良才著。

④ 拙撰《孙逸仙先生传》本论文中有关孙先生言行均按是书，不一一注明，以节省篇幅。

- ⑤ 邮票首日封实物,相湘多年以来均喜集邮,今仍如此。
- ⑥ 拙撰《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社刊行)有《容闳欣见民国肇建》即根据容闳自传英文原书及中译称《西学东渐记》文言本,商务印书馆刊。今有白话中译本《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刊)并参考耶鲁大学校刊、日本外务省档案等。李荷玛、布斯信件(现藏美国史丹佛大学)《国父全集》已有中译文。描述此论文时又参考《容氏谱牒》中的容联芳撰《容闳传》。是何广棣根据已故罗香林教授收藏而按《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书目季刊,台北学生书局刊行)本论文中有关容闳言行均据上述史料,不另一一注明。
- ⑦ 拙撰《天演宗哲学家严复》原刊《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1960年8月刊,后汇编于《民国百人传》第1册中。
- ⑧ 同⑦引《西学东渐记》。
- ⑨ 拙撰《林则徐与禁烟节》《魏源与海国图志》均载于拙撰《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中。(台北传记文学社,1970年刊行)。
- ⑩ 拙撰《晚清宫廷史记》(台北中正书局)。
- ⑪ 拙撰《詹天佑是国人自筑铁路的先导》,汇载于拙撰《民国人物列传》中。(台北传记文学社,1985年刊行)。
- ⑫ 《美国华侨史》第9卷第5段:刘伯骥著,台北黎明出版公司刊行。
- ⑬ 拙撰《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载于拙撰《民国史纵横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刊行。后香港有两种偷印本,且流传于美国书局出售。
- ⑭ 《郑观应传》,夏良才著。
- ⑮ 《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刊,上册第204页。
- ⑯ 拙撰《戊戌政变之国际背景》汇刊于拙撰《晚清宫廷人物》第一卷。
- ⑰⑱⑲ 拙撰《容闳欣见民国肇建》,刊于《民国百人传》第1册。

- ⑳ 《许芹传记》Reminiscences of Huie Kit (San yu-press, peiping 1932) P60
- ㉑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件复印本。
- ㉒ 《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11月刊行)“函电”第138至139页。
- ㉓ 拙撰《中国空军奋勇保卫祖国领空》中国对日抗战胜利50周年国际讨论会论文。(引录《中国空军抗日战史》及《民国空军的航迹》与《梅乔林传》《革命人物志》等书)。
- ㉔ 《严复集》,王棊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刊,第1册及第2册续文(上)(下)。
- ㉕ 《中国近代思想家》(46)严复。郭正昭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
- ㉖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摘《几道文抄》,1922年蒋贞金抄。上海国华书局印行。1971年台北世界书局复印刊行。
- ㉗ 拙撰《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末“注五”引录严复手谕其第四子琼函。《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初刊时曾刊是函原件摄影。以原函未收入《严几道先生遗著》,亦未见王棊主编的《严复集》,是相湘1960年在南洋大学任教时,与严琼(季将)先生晤谈,承其见示,并应相湘建议将所有存件及“天演宗哲学家”图记均捐献南洋大学。后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今应存放于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 ㉘ 拙撰《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4编第17章。又拙撰《从史实探讨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影响》汇载于《民国史纵横谈》。
- ㉙ 拙撰《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5编第45章,第456节。
- ㉚⑳ 拙撰《蒋梦麟振兴北大复兴农村》汇载于《民国百人传》第四册。
- ㉛ 拙撰《中山先生敬重胡适教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2卷第5期。
- ㉜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载《严几道文抄》。
- ㉝ 拙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58页。

(责任编辑 江中孝)